

·文史新探·

简帛古书中的分栏抄写*

王化平

内容摘要:文章利用简帛古书材料,分析了分栏(旁行)这种抄写格式在实际运用中的一些现象,并据此推测了《墨子·经上》、《经下》两篇在简策时代的抄写情况。认为分栏抄写在简帛古书中至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较为简单的,一种是较为复杂的。分栏抄写在战国秦汉时期是一种相当常见的格式,史书、数术文献、历谱、杂纂文献和书籍目录都可能采用,司马迁撰《史记》时创设“十表”未必要远效《周谱》。

关键词:简帛 分栏 旁行

在近些年出土的简帛古书中,出现了很多分栏抄写的情况,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以下一些^①:

文献	分栏数	抄写时代	出土地点或出处	备注
编年记	2	秦统一前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	
为吏之道	5	秦统一前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	
日书(甲、乙)	栏数不定,最少2栏,最多8栏	秦统一前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	少数简直行
质日	2	秦统一前后	岳麓书院藏秦简	
为吏治官及黔首	栏数不定,最少2栏,最多4栏	秦统一前后	岳麓书院藏秦简	文末直行
占梦书	2	秦统一前后	岳麓书院藏秦简	少数简直行

* 基金项目: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20世纪以来《易经》新释的整理与研究”(SWU1309001)。

①表中所引资料有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朱汉民和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1985年)、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中西书局,2013年)、朱凤瀚《北大藏秦简〈从政之经〉述要》,《文物》2012年第6期。

(续表)

文献	分栏数	抄写时代	出土地点或出处	备注
语丛(三)	2	战国中晚期	湖北江陵郭店楚墓	九支简分栏
五十二病方“目录”	4	西汉初年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正文直行
养生方“目录”	4	西汉初年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正文直行
历谱	2	秦统一后	湖北荆州关沮秦墓	
筮法	最少4栏,最多6栏	战国时期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文末直行
从政之经	4	秦统一前后	北京大学藏秦简	文末直行

从上表可以看出,采用分栏抄写的有史书、数术文献、历谱、杂纂文献和书籍目录,类型较多。而在上表没有统计的遣册中,分栏抄写更是常见。这说明分栏抄写在战国秦汉时期是一种非常多见的格式。

从出土古书的情况看,这种抄写格式在实际运用中非常灵活,有许多变化,并在后来的文献中继续应用。但现在少有学者总结这种格式的情况,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做一点初步的探讨。

将这种格式称为“分栏”是现代人的叫法,在古代实称为“旁行”。汉人在描述西域安息国的书写时就用“旁行”一词,如《史记·大宛列传》:“画革旁行以为书记。”《索隐》引韦昭云:“外夷书皆旁行,今扶南犹中国,直下也。”^①《汉书·西域列传》注引服虔曰:“横行为书记也。”颜师古曰:“今西方胡国及南方林邑之徒,书皆横行,不直下也。”^②可知“旁行”是与“直行(下)”不同的一种书写方式。在简策上分栏书写时,每栏内虽然是先竖行,再自右往左写,但就每一支简而言,是完全不同于通简直下的,故称之为“旁行”。

在传世的先秦子书中,也有旁行的情况,比如《墨子·经上》、《经下》两篇。由于旁行的读法不同于直行,故古代学者在理解这两篇时产生了一些混乱。为此,栾调甫先生曾专门研究过旁行,并总结出旁行“正变六例”:

一、上下重各章均依其首章之首一字为齐格。

二、凡一篇章数奇者,则下重多一行(《史记正义·谥法解》则上重多一行)。

三、上下重各章,不论长短皆尽一行写之。

四、上重长章字多,则占下重行间写之。而下重相值之章即低下写之,不必与其左右各章之首一字齐。

五、上重长章占下重行间过多,或下重相值之章字亦多,则下重空置此行,而向左移一行写之。

^①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14年,第3839页。

^②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0页。

六、下重长章字多,而其上重相值之章短者,则提上写之,亦不必与其左右各章之首一字齐。^①

栾调甫先生认为在简策时代不太可能出现分栏抄写,《经上》等篇的旁行抄写当发生在写卷时代,极可能在两晋时期^②。现在看来这个推测恐怕难以成立,在以简帛为载体的时代,《经上》等篇就有可能分栏抄写。

以孙诒让的断句计算,《经上》包括“读此书旁行”(孙诒让认为此章本是注文,误入经文)一章在内,总共 101 章。“读此书旁行”是倒数第二章,其后还有一章“正无非”(毕沅认为此章亦是注文,孙诒让以为《经说上》篇对此章有说解,当是经文,孙说是)^③。其实,“读此书旁行”一章不管是否经文本有,它都应该是全篇的最后一章,也就是说它本应在“正无非”之后。孙诒让以旁行法重录之后,“读此书旁行”一章仍在“正无非”的上一栏,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经上》在变成直行之前,本是分两栏书写(即栾调甫先生所说的“上下重”),第一栏抄 51 章,最末一章是“正无非”;第二栏抄 50 章,最末一章是“读此书旁行”。在这种情况下,以惯常的直行阅读或抄写时,会将第一栏最末一章读为全篇的最末一章,将全篇的最后一章读作倒数第二章。《经说上》将解释“正无非”、“诺不一利用”的句子放在篇末,应同样是抄写颠倒错乱的结果。

从清人的句读看,《经上》以短章居多,最长一章也不过 11 字,即“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一般来说,单枚竹简容字通常在 20 到 40 字之间^④。因此,《经上》全文分两栏抄写,每枚简分上、下两重应该可以整齐地抄写上去,不存在栾调甫所说的第四、五、六种情况。不过,某些文献中确有可能出现某一栏中的文句太长的情况,这个时候就会按第四、五、六这样的原则来调整。如此一来,就有可能出现一卷竹简中的分栏数随时变化,甚至时而旁行,时而直行的现象。比如《经下》,最长一章有 23 字,即“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如果抄写在较短的竹简上,另一栏的文字恐怕就需要调整,以便将全章内容完整抄写在一支简上。

从出土简策的情况看,上述推测也是成立的。例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第八六正、八九正两支简就有因上一栏文字过长,导致下一栏文字下移,其首字不能与两侧文字对齐;第一〇〇正简则因文字过长,不再继前简旁行,而是改为直行。由于文句往往长短不一,且又要考虑充分利用书写空间,所以旁行除分两栏之外,还可分三栏、四栏、五栏,甚至更多。当需要绘图时,分栏则更为复杂,这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①栾调甫:《旁行释惑》,氏著《墨子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3-54页。

②栾调甫:《旁行释惑》,《墨子研究论文集》,第53页。

③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第195页。

④骈宇騫:《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不过,从出土的简帛古书材料看,古人分栏抄写时似乎较为随意,不会拘泥于某些规则,如在郭店楚简《语丛三》中,就出现了分栏抄写的一章文字被分抄在两支简上的情况,“有性有生乎名”中的前五个字在第68支简的下栏,最后一个字则位于第69支简的下栏。清华简《筮法》在分栏抄写时,屡屡出现同一章文字写在好几支简上的情况。出现这种现象显然与文献的内容、抄写者的主观安排有关。《筮法》大部分章节的开头是四个三爻卦象,为使卦象看起来清晰、美观,并体现出“四位”空间,抄写者特意将它们分抄在两支简上(同样是抄写四个三爻卦,包山楚简、葛陵楚简则抄在一支简上)。这样一来,抄在卦象下的占辞自然就随之断开,出现在两支甚至更多的竹简上。

一般来说,分栏抄写的简策应是先编后写,但也不排除有先写后编的情况,如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①。在先编后写时,为求效果精美,可能会在抄写前做周密的谋划,如清华简《筮法》。也有抄写潦草的,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不仅字小,而且整体给人凌乱之感,竹简背面也抄有文字。像这种情况多半是抄写前没有仔细计划,或出于临时应急。

以上所说的分栏是较为简单的,简帛古书中还有复杂一点的分栏方式,比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算表》。这部文献共21支竹简,自然形成21列,由3道编绳和18条朱色栏线将竹简分成20行(栏)。第一列从第二行开始,自上往下书写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半,共19个数字(“九十”上端有留白),第二列是一支钻有圆孔的简,上面不书写数字,从第三列的第一行开始,自右往左,同样书写以上19个数字。行、列交汇则成一个“单元格”,内中书写两个数字相乘的结果^②。

像《算表》这种分行分列,形似今日所说“表格”的抄写格式在实用性文献中并不少见。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也有这种抄写格式,其第一篇《除》共分十三列、十三行,第一列的每一栏是月份及对应的星宿名,如“十一月斗”等;第一行抄写十二种日子的称法,如建、彼、平等。行、列交汇形成“单元格”,其中写十二地支,即日期。从这个表可以查出任一月份中任一日期称法,如十一月寅日、十二月卯日等都是“建”。

在传世文献中,创作于西汉的《史记》“十表”也采用了“旁行”的格式,清人孙德谦云:

《史记》“十表”,尽用旁行,其法则本之谱牒。《梁书·刘杳传》:“王僧孺被敕撰谱,访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谭《新论》云《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当起周代。如刘杳据桓氏说,表之旁行斜上,是马迁依仿《周谱》而作。”^③

①朱汉民、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前言》,第2页。

②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下册,第135-136页。

③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上海书店,1983年,第336页。

从简帛古书看,许多历谱确实用旁行格式抄写,它们与“十表”中的诸“年表”本是性质相似的文献。这种格式在战国秦汉时期既然相当普遍,则司马迁未必需要远效《周谱》。《周谱》一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也不见于《三代世表》前的“太史公曰”,桓谭的说法可能仅是因为《周谱》的格式与《三代世表》类似而已。

不过,司马迁也有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代世表》的格式设计上。此表将格式上的分栏与内容上的分类相结合,很好地将自黄帝以下的帝王世代更替次序和历代首位帝王的祖先世系融合在一个表内。在这个表中,列与列的联系并不紧密,每行均可独立成文。若将排在第二至第七行“颛顼属”、“佶属”、“尧属”、“舜属”、“夏属”、“殷属”、“周属”等最末尾的帝王与第一行“帝王世国号”下相应位置接续的话,便可看出每位帝王都可上溯至唯一的始祖黄帝。因此,赵益先生认为桓谭所说的“旁行斜上”仅指《三代世表》是很有道理的^①,它与一般的“旁行”确实不同。

【作者简介】王化平,男,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①赵益:《〈史记·三代世表〉“斜上”考》,《文献》2012年第4期。